

公共信息接触如何影响不同类型的政治参与 ——政治讨论的中介效应

张凌

摘要

通过湖南长沙一次社会调查的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不同类型的政治讨论(人际政治讨论和互联网政治讨论)如何在来自不同渠道的公共信息接触和制度化、非制度化参与之间发挥中介效应。研究发现:人际政治讨论在本地传统媒体的公共信息接触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在论坛网站的公共信息接触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互联网政治讨论在基于本地传统媒体和论坛网站的公共信息接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完全中介作用;政府自媒体的公共信息接触虽然能够推动互联网政治讨论和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生,但并未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正向影响。在公众政治参与意愿增长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结论将给政府的相关制度构建提供参考。

关键词

公共信息接触、政治讨论、制度化政治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

作者简介

张凌,湖南农业大学讲师,传播学博士,邮箱:zhangling@hunau.edu.cn。

How Public Information Exposure impacts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Mediated Role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ZHANG Ling

Abstract

Basing on a survey in Changsha, by using SEM, This paper analyzed how different types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played mediated role between public information exposure from different channels and institutional and un-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study found that Interpersonal political discussion had played suppressing role between information exposure from traditional media and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ternet political discussion had played mediated role between information exposure from traditional media, website and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ublic information exposure from government's we media had promoted

internet discussion and institutional participation, but had not positively impacted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With the growth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the results can a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 to build related institution.

Keywords

Public Information Exposure, Political Discussion, 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Un-institution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Authors

Zhang Ling, lecturer of Hu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phd, e-mail: zhangling@hunau.edu.cn.

政治参与是普通民众所进行的政治活动，目标在于影响政府的决策（Huntington&Nelson，1976），它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功能实现的重要基础（帕特南，2011）。政治参与的形式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而发生着改变，目前除了投票等制度化形式，诸如请愿、游行等非制度化形式也大量增加。近年来，我国学者对政治参与的研究在持续增长，这或许与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变革息息相关。一方面，在一些地区，竞争性选举制度建立起来，农村的村委会选举和政治参与得到广泛关注（胡荣，2006）；另一方面，城市居民的互联网技术给公民提供了表达的渠道，互联网政治参与正在崛起（杨国斌，2013；张明新，2015）。

政治参与往往被多元因素所影响，诸如教育程度、收入程度、媒介使用、公共信息接触、政治知识、政治讨论等都影响了公民的参与（McLoid&McDonald，1985；McLeod et al.，1999），其中，政治讨论被认为是连接了信息接触、政治知识和参与的重要变量。既有的文献探讨了在这个过程中政治讨论的作用（Lee，2009；2012），但随着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政治讨论的形式趋于多样，除了人际政治讨论，人们大量地参与互联网政治讨论。而目前，对不同类型的政治讨论在我国公众的制度化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的研究仍非常匮乏。本文将通过湖南长沙一次社会调查的数据，分析公共信息接触、不同类型的政治讨论对两种类型政治参与的影响机制。

一、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一）政治参与

政治参与传统上被界定为通过制度化渠道的公民参与，例如党派和公民组织的成员身份，参与选举和投票等（Dalh，1971）。这类参与是等级的和精英导向的，

公民按照精英的规则参与这些选举活动。近年来，制度化渠道的政治参与开始逐渐衰减，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逐步增加（Inglehart, 1997；Inglehart&Catterberg, 2002），诸如请愿，游行，抵制和其他挑战精英的活动大量增加，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后工业化国家公民活动的实质构成部分（Inglehart&Catterberg, 2002）。在我国，政治参与行为是多样化的，主要体现在制度化的不同程度上，按照不同程度，政治参与可分为非制度化、低制度化和高制度化三类（胡荣，2008）。制度化政治参与常常指按照程序进行的参与行为，例如选举、信访、行政复议、听证等（张明新，2011）。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指公民不通过现有的法律、政策或惯例规定和允许的渠道却试图对公共行政进行干预（陈云松，2013）。

按照亨廷顿（1976）和维巴（2014）的研究，政治参与的目标往往在于影响公共政策的制定或政府的决策。这就将政治参与和日常的政治讨论区分开来。公众日常的讨论和表达虽然也代表了对政治事务的关切，但只有那些试图参与政治过程、影响政府行为的政治表达，才更加类似于政治学层面所谈论的政治参与行为。当前我国，公众政治参与的程度不高，以政府为对象的政治表达是其中重要形式，具体包括找政府机构，借助媒体表达（唐文方，2008），“话语参与”，网络参与等，而制度化的参与则较低（周葆华，2011）。

综上，本文将公众通过不同渠道向政府表达政治诉求，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行为视为政治参与，具体分为制度化和非制度化两种形式。制度化的政治参与是公众通过政府机构所提供的渠道向政府部门表达诉求，试图影响决策的行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是公众不按照既定的程序，而是通过引起舆论关注的方式来实现诉求，影响决策的行为。政治参与往往受到多元因素的影响，其中公共信息接触和政治讨论是被考虑得比较多的影响因素。

（二）公共信息接触

公共信息接触往往被认为是政治参与的重要前项。在那些比较政治知识、政治效能感和政治参与的相关研究中，往往都会考虑类似概念，诸如媒介接触（Media Exposure），媒介使用(Media Use)的影响。这类研究的一个共同前提是人们通过不同渠道获取公共信息，其结果并不是等同的。换句话说，我们不能仅仅通过探讨公众接触媒介信息的总量来判断信息传播的效果。上个世纪80年代，贝克和怀特尼（Becker&Whitney, 1980）提出不应将媒介作为一个整体来对待，而应区别人们对于不同媒介的依赖，区分新闻的不同的媒介来源是探讨新闻效果的重要变量。在政治传播研究中，很少有研究能观察到政治信息对人们的强的直接的效果，学者认为

原因也在于对政治信息的各类出口之间的多元关系缺乏考虑。

因此,在对公共信息接触进行操作化时,本文主要考虑渠道的差异性和地方特征。在地方层面,公众获得本地公共信息的渠道可被分为三类:包括报纸、广播、电视在内的传统媒体;包括论坛、门户网站社交媒体在内的网络媒体;包括政府网站、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在内的政府自媒体。虽然当前,网络大V、公众号等也是人们获得各类信息的重要信源之一,但一方面它们的主要关注点在于全国范围内关注度较高、新闻价值大的事件,在地方公共信息传播方面发挥作用较小;另一方面,来自公众社交媒体朋友圈中的信息的可信度相对较低,因此本文对公共信息接触的操作化,仅考虑了以上三类最权威和常用的渠道。媒介是政治信息的主要来源(Graber, 1988),通过媒介,公众获得更多的公共信息、增加了公众的政治知识(张明新, 2011),促进人们参与政治讨论的兴趣,而政治讨论又影响了政治效能感、观点的质量、立场等,政治讨论被认为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Lee, 2009)。

(三) 政治讨论

政治讨论是日常社会民主系统的一个部分(Mansbridge, 1999)。在当前的研究中,政治讨论测量最常见的指针是频率,询问受访者与他人谈论政治的频率。

“政治”的概念具有广泛的包容性和复杂性,是人类集体生活的一种组织和安排(燕继荣, 2004),因此在对政治讨论概念进行操作化时,调查问题往往涵盖了政治、社会生活的多个方面,例如李(2009)的测量问题为“与不同的人探讨政治和公共事务的频率”;Nir(2012)询问讨论政治和当前实事的频率。李(2012)提问了公众讨论教育、社会福利、环境保护、政府表现、民主发展等议题的频率。本文的政治讨论操作化为公众与不同人群探讨当地社会、经济、公共事务及政府行为的频率。此外,有别于后文的政治参与,政治讨论并不以影响政府决策,进入政治过程为直接目标的。

学者研究了不同环境下日常的政治讨论是否能够带来意图之中的结果,诸如观点质量的提升和参与(Kim, Wyatt&Katz, 1999)。政治讨论广泛存在,常被分为人际政治讨论和互联网政治讨论两种类型。在本文中,人际政治讨论指与生活中的家人或朋友谈论自己所关注的公共议题的行为。人际讨论往往被认为是媒介接触的结果(David, Cappella&Fishbein, 2006)。当人们进行讨论时,个体往往投入努力来理解讨论的主题,衡量来自不同讨论对象的各类观点,组织自己的思维从而表达想法(Benhbib, 1996)。媒介帮助个体组织他们关于想象共同体的思想,同时也提

供了可以导致公众行动的政治讨论 (Shah, Rojas&Chocolate, 2009)。政治讨论往往被界定为新闻信息接触产生效果的重要条件(Cho et al., 2009; Shah et al., 2007)。人际讨论常常被认为是中介或调和了媒介传播的效果 (Hardy&Scheufele, 2005)。

信息技术发展之后, 互联网政治讨论成为人们日常政治讨论的重要形式。互联网政治讨论指公众通过论坛网站、QQ、微信、微博等, 与网友谈论公共议题。政治讨论能够使公众对政治议题进行审慎的思考, 而审慎的思考带来更强的政治趋向和政治参与(Eveland, 2004; McLeod et al., 1999)。因此, 在线的政治传播也被认为是新闻接触对政治参与产生效果的中介因素 (Cho et al., 2009; hah et al., 2007), 在对通过电子邮件和在线论坛发生的政治讨论研究中, 学者已经观察到互联网政治讨论在政治参与方面的潜在效果 (Shah et al., 2005)。

(四) 研究框架和假设

一般来说, 政治参与水平在社群和个体之间分布不均衡, 因此在解释公民政治参与的理论模式中, 人们的教育、职业、收入等往往被认为是影响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但目前随着公民政治参与水平的下降, 西方学者的研究中, 教育与参与水平的正相关已经趋于消失(Sanders, 2007)。我国的定量研究中也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大部分研究都没有证明教育水平对政治参与的正向影响 (胡荣, 2006)。考虑到既有对政治参与的解释性研究中, 公众传播行为显现的较强的解释力, 下文的理论模型中暂不考虑教育和收入因素, 而集中分析以上三类行为之间的相互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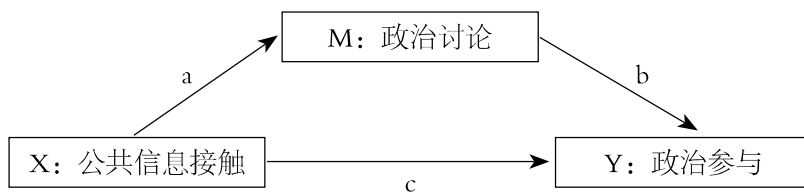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框架和假设

一般认为, 媒介使用和政治参与之间存在一种间接的中介效应, 它们发生于传统的效果研究的不同阶段(Barry, 2002)。传播变量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虽然互为因果, 但两者的关系是非对称的, 传播变量先于政治变量, 政治讨论对将来参与的影响更强(Rojas, 2008)。西方学者的实证研究认为政治讨论具有影响公民付诸政治参与行为的积极效果, 是促进政治参与的重要因素。传播的中介效用模型支持政治讨论和媒介信息使用导致了更多的公共参与 (McLeod et al., 1996)。此外, 传播实践对参与行为有直接效应, 但也通过政治知识, 政治效应的增长间接提升了参与

(McLeod et al., 1999), 三者的关系如图一所示。图一假设在公共信息接触、政治讨论、政治参与三个概念的相互关系中, 政治讨论发挥了中介作用。在我国, 虽然学者目前并没有对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和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但部分研究探讨了概念之间的关系。首先实证研究部分支持了公共信息接触对政治讨论的正向影响。特定类型的媒介使用提升了媒介信息处理能力, 而这一能力预示着更高的媒介参与意向(周葆华, 陆晔, 2008), 网民对报纸和电视新闻的接触能显著预测他们的政治讨论水平(张明新, 2015)。而上个世纪80年代末政治学者的研究表明更高的政治讨论频率的公民更加认同“对待政治的最好态度是积极参与”的观点。(张明澍, 1994)

本文按照图一的研究框架, 构建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 按照中介效应的检验步骤(温忠麟等, 2004), 使用AMOS软件检验政治讨论的中介效应: (1) 首先检验公共信息接触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方程1: $Y=cX+e_1$, 如果 c 显著, 则按中介效应理论, 否则停止分析; (2) 在加入政治讨论变量之后, 检验公共信息接触对政治讨论的影响, 方程2: $M=aX+e_2$, 以及公共信息接触和政治讨论对政治参与的影响, 方程3: $Y=c'X+bM+e_3$ 如果 a 和 b 都显著, 意味着 X 对 Y 的影响至少部分通过中介变量实现, 如果 a , b 有一个不显著, 则进行第四步检验; (3) 检验方程3, 观察系数 c' , 如果 c' 不显著, 说明是完全中介过程, 如果显著, 说明是部分中介过程, 检验结束; (4) $sober$ 检验, 如果显著, 则 M 的中介效应显著, 否则不显著, 检验结束。

以上是本文对三个概念之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假设, 从当前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 无论是公共信息接触、政治讨论、政治参与都不是单一维度概念, 因此在分析三者的关系时, 需要考虑概念的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转型时期我国的政治参与虽然与西方学者所界定的参与存在明显差异, 但不可否认的是政治参与在我国已经广泛存在。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形式并存, 政治传统的影响使公众在表达诉求时往往诉诸于更高级别的领导, 同样改革开放之后, 舆论的力量, 使得借助于媒体的政治表达十分盛行。此外社会的发展使得公众获得信息、进行政治讨论、政治表达的渠道都十分多元。下文将基于以上研究框架, 探讨三个概念的不同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厘清不同类型的政治讨论如何在公众接触不同渠道公共信息和制度化和非制度化参与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二、研究方法

(一) 调查地点和方法

本次调查选择在湖南省长沙市进行。长沙土地面积11816平方公里，2013年户籍总人口662.81万，常住人口722.14万，地区生产总值7153.1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99570元，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3662元（长沙市统计局，2014）。本次调查基于在地（Local）经验，这也符合公众传播行为研究的一般倾向，例如在探讨报纸使用和投票行为的研究中，威斯康星麦迪逊（Mcleod et al.,1996），西雅图、华盛顿（Moy et al., 2004），等都曾经被作为研究的样本地区。在长沙市，公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的行为相对活跃，有利于采集到有效的数据。

本次调查采用滚雪球的方法进行抽样。从2014年12月-2015年4月，研究使用问卷网所提供的调查服务，通过电脑或手机发送链接邀请朋友进行推广和填写。为了避免滚雪球方法带来的样本的同质性问题，在推送问卷链接时，有意识地结合了分层抽样的方法，邀请不同学历、不同职业的受访者填写问卷。考虑到电子版问卷对访问对象信息素养的要求，样本可能因缺乏中老年样本而缺乏代表性。研究辅以面访的调查方法，收集资料。通过进入长沙市几个档次不同的商品房小区和普通居民社区对中老年人进行访问。

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628份，其中电子版问卷396，纸质版问卷230，回收率为100%。在对问卷进行逻辑检查和幅度检查后，去掉废问卷45份，最终回收有效问卷583份。有效回收率为92.8%。在分析过程中排除7份有缺失值的问卷，最终577个样本进入统计。583份样本的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表1：样本的基本情况（N=583）

人口变量	具体分类	百分比（%）	人口变量	具体分类	百分比（%）
性别	男	46.4	年龄	18-25	33.1
	女	53.6		26-35	31.7
文化程度	初中以下	1.2		36-45	24
	初中	2.7		46-55	8.1
	高中/中专/技校	10.3		55以上	3.1
	大专或大专在读	14.1	月收入	目前没有收入	27.4
	本科或本科在读	51.6		2000元以下	5.5
	研究生及以上	20.1		2001-3000元	10.5
				3001-5000元	29
				5001-7000元	9.3
				7001-9000元	5.1
				9001以上	13.2

（二）量表

本文涉及三个变量：公共信息接触、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

问题1、2测量公共信息的接触。问题1询问如果公众要了解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政府部门决策和日常活动的信息，使用以下媒体的状况。五个题项分别是R1.“长沙晚报”“潇湘晨报”等本地报纸；R2.“政法报道”“都市一时间”等本地电视节目；R3.“湖南电台交通频道”等广播；R4.“星辰在线”“大湘网”等本地新闻网站；R5.“红网”“星辰在线”等本地论坛；R6.浪，腾讯等门户网站。5点量表为从不、偶尔、有一些、比较多、很多。通过主成分因子分析（方差极大化正交旋转），提取两个因子，R1-R3反映本地传统媒体公共信息接触状况，R4-R6反映通过论坛网站进行信息接触的状况，Cronbach's alpha分别为.694，.591。问题2询问公众使用地方政府自媒体的状况，具体问题是：您平时做以下事情多吗？题项分别是R7.登陆本地政府网站；R8.浏览本地政府部门的微博；R9.浏览本地政府的微信公众号。问题2提取1个因子，反映公众通过政府自媒体接触公共信息的状况，Cronbach's alpha分别为.797。

问题3询问公众参与政治讨论的情况。具体问题是：请问您与以下不同的人探讨关于长沙市经济、社会发展、政府部门行为等议题的频率？R10.与家人，R11.与朋友，R12.本地论坛的网友，R13.QQ群，微信群的朋友，R14.微博上关注同一话题的朋友。五点量表是从不，偶尔，有一些，比较多，很多。问题3提取两个因子，R10-R11反映参与人际政治讨论的状况，R12-R14反映互联网政治讨论状况，Cronbach's alpha分别为.735，.793。

问题4询问公众政治参与的状况。具体问题是公众如果对本地政府的某项行政行为不满，或觉得自己或朋友遭到本地政府的不公平对待会如何行动：R15.我会在红网等本地论坛发帖；R16.我会发微博或朋友圈等社交媒体；R17.我会给本地的报纸或电视台打电话，寻求媒体关注，R18.我会直接找相关部门或领导投诉；R19.我会打电话，写邮件，与相关部门进行沟通；R20.我会给公开了电话号码的相关领导打电话；R21.我会申请行政复议或进行行政诉讼。五点量表为完全不符合、基本不符合、有一些符合、比较符合。问题4提取两个因子，R15-R17为非制度化政治参与，R18-R21为制度化政治参与，Cronbach's alpha分别为.736，.839。

（三）统计方法

本文采用SPSS16.0和Amos17.0对数据进行分析。在因子分析所得到的量表基础上，为了探讨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和两种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效应，使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本文的两个理论模型进行检验。本文按照Kline（2011）的建议，选

取以下指标对理论模型的拟合程度进行评估： χ^2/df ，RMSEA，GFI，CFI，NFI。 χ^2/df 小于3比较理想。RMSEA判断理论模型与完美拟合的饱和模型的差距，其界值定位0.08比较好。GFI为拟合指数，一般认为GFI大于0.9比较理想。标准化RMR小于0.05较好，小于0.08则普通。NFI、CFI反映假设模型与一个观察变量间没有任何共变假设的独立模型的差异程度，NFI大于.90、CFI大于.95可视为具有理想的拟合度。

三、研究结果

（一）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与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作用

为了验证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文按照温忠麟等（2014）建议的中介效应分析方法，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政治讨论的中介效应。

第一步，建构不包括中介变量（人际政治讨论和现实政治讨论）的直接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公共信息接触的三个维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的直接效应模型拟合良好（ $X^2=148.856$ ， $X^2/df=2.523$ ，CFI=.962，GFI=.961，TLI=.949，RMSEA=.051，NFI=.938，SRMR=.0485）。三个维度：本地传统媒体C1（ $\beta=-.195$ ， $p<.005$ ），论坛网站C2（ $\beta=.218$ ， $p<.05$ ），政府自媒体C3（ $\beta=.248$ ， $p<.005$ ）。公共信息接触的三个维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系数C均显著，按中介效应立论。

第二步将政治讨论作为中介变量纳入中介效应模型，在对误差的共变现象进行修正后，得到了模型1（图1），模型拟合水平良好（ $X^2=212.689$ ， $X^2/df=1.787$ ，CFI=.973，GFI=.961，TLI=.961，RMSEA=.037，NFI=.941，SRMR=.0398）。其中，人际政治讨论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系数b显著（ $\beta=.21$ ， $p<.001$ ），互联网政治讨论对制度化政治没有显著影响，删除路径。公共信息接触概念的二个维度对人际政治讨论影响系数a显著，其中本地传统媒体公共信息接触对人际政治讨论影响a1（ $\beta=.26$ ， $p<.001$ ）；论坛网站对人际政治讨论影响a2（ $\beta=.32$ ， $p<.001$ ）；自媒体对人际讨论影响a3不显著，因此对政府自媒体的效应需要做Sober检验。检验统计量是 $z=ab/\sqrt{a^2s_b^2+b^2s_a^2}$ ，将之与基于标准正态分布的临界Z值进行比较，Z值大于临界Z值，说明中介效应存在，否则中介效应不存在（方杰等，2012），经计算 $Z=0.813<1.281(p=0.1)$ ，所以人际讨论没有在政府自媒体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中介作用。

模型1中,公共信息接触概念的三个维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 c' 显著,其中本地传统媒体 $c1'$ ($\beta = -.24, p < .001$),论坛网站 $c2'$ ($\beta = .18, p < .05$),政府自媒体 $c3'$ ($\beta = .22, p < .005$)。

最后,比较 ab 和 c' 的符号, $a1b$ 和 $c1'$ 异号,属于遮掩效应, $effect = |a1b/c1'| = 0.2275$; $a2b$ 和 $c2'$ 同号,属于部分中介效应,网络论坛的公共信息接触通过人际政治讨论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所起的中介效应,占网络论坛对制度化政治参与总效应的比值为 $effect = a2b/c2' = 0.3733$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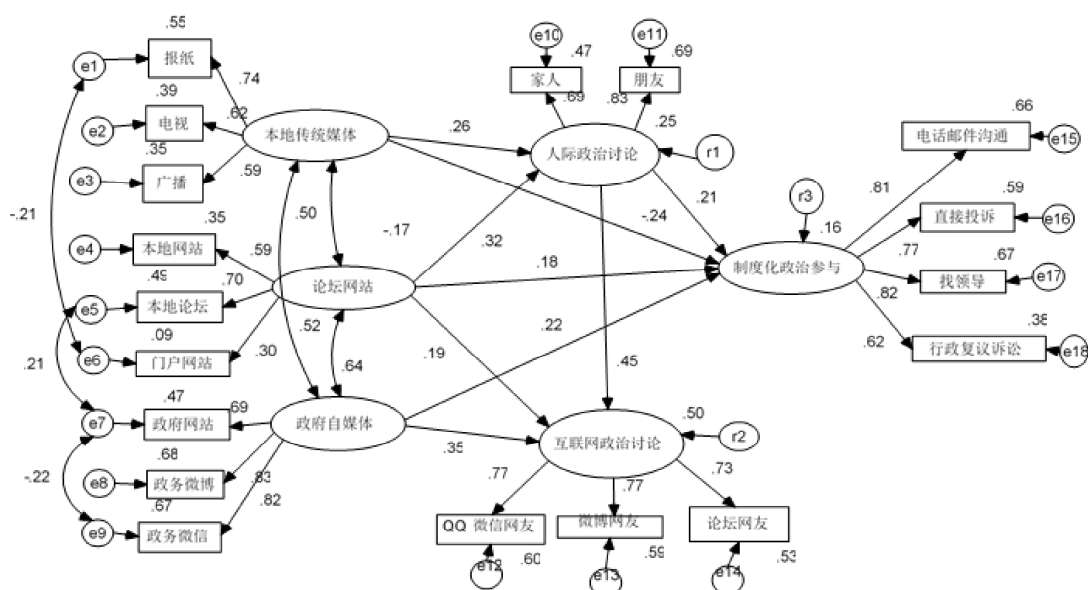


图2 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模型(模型1)

(二) 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中介作用检验

本部分仍按照以上步骤检验政治讨论的中介作用。首先构建不包括中介变量(人际政治讨论和现实政治讨论)的直接效应模型。结果表明,公共信息接触的三个维度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的直接效应模型拟合良好($X^2=115.798$, $X^2/df=2.573$, $CFI=.962$, $GFI=.960$, $TLI=.942$, $RMSEA=.052$, $NFI=.938$, $SRMR=.0428$)。公共信息接触概念的二维度:本地传统媒体 $C1$ ($\beta = -.17, p < .05$),论坛网站 $C2$ ($\beta = .33, p < .001$)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显著,按中介效应立论。政府自媒体 $C3$ 对非制度化参与影响不显著,停止分析。

第二步将政治讨论作为中介变量纳入模型,在对误差的共变现象进行修正后,得到了模型2(图2),模型拟合水平良好($X^2=255.061$, $X^2/df=2.406$, $CFI=.950$, $GFI=.961$, $TLI=.936$, $RMSEA=.049$, $NFI=.918$, $SRMR=.0457$)。其中,公共

信息接触的三个维度对互联网政治讨论影响均显著,本地传统媒体a1 ($\beta = -.18$, $p < .05$); 论坛网站a2 ($\beta = .20$, $p < .05$); 政府自媒体a3 ($\beta = .35$, $p < .001$); 互联网政治讨论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b显著 ($\beta = .35$, $p < .001$); 人际政治讨论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无影响,删除路径。在模型2中,公共信息接触概念的三个维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c'均不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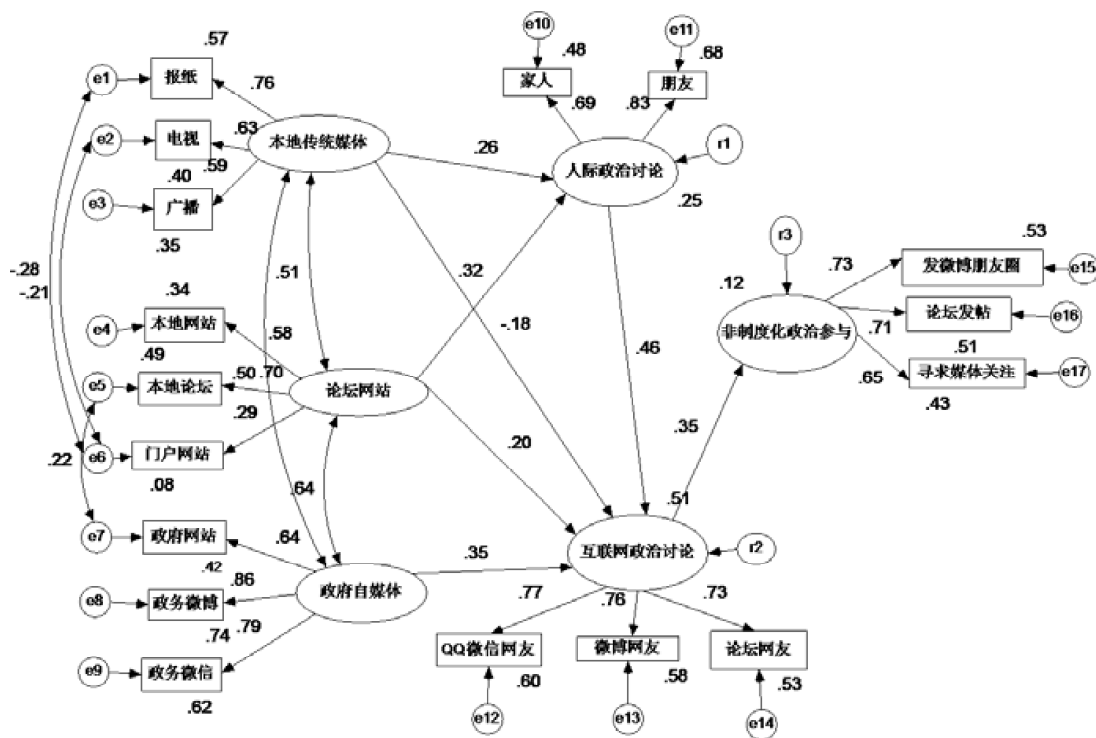


图3 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模型 (模型2)

(三) 稳健性检验

因为抽样方法的局限,本文样本的分布与实际情况相比略有偏差。为了验证研究的稳健性,本部分随机抽取18-35岁2个年龄组的60%,与其它组一起进行分析。模型1直接效应模型显著 ($X^2=142.977$, $X^2/df=2.423$, $CFI=.953$, $GFI=.952$, $TLI=.938$, $RMSEA=.058$, $NFI=.923$, $SRMR=.0516$)。三个维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均显著,纳入中介变量后,模型拟合结果 ($X^2=202.453$, $X^2/df=1.716$, $CFI=.968$, $GFI=.951$, $TLI=.959$, $RMSEA=.041$, $NFI=.928$, $SRMR=.0443$),模型1成立。

模型2的直接效应模型拟合良好 ($X^2=139.131$, $X^2/df=2.899$, $CFI=.936$, $GFI=.948$, $TLI=.952$, $RMSEA=.067$, $NFI=.906$, $SRMR=.0573$)。公共信息接触概念的二个维度:本地传统媒体,论坛网站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影响显著,纳入中介变

量后,模型拟合结果($X^2=229.716$, $X^2/df=2.167$, $CFI=.947$, $GFI=.941$, $TLI=.932$, $RMSEA=.052$, $NFI=.907$, $SRMR=.0530$),相关路径显著,模型2成立。

四、讨论和结论

从研究结果来看,前文提出的研究框架中公共信息接触、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三者之间的关系基本得到验证,但是对制度化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而言,公共信息接触和政治讨论概念的不同维度之间的关系则有所差异。

(一) 人际政治讨论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

在模型1中,人际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而互联网政治讨论则并未发生预期作用。其中,人际传播在本地传统媒体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遮掩效应;在论坛网站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

第一、人际讨论在本地传统媒体的公共信息接触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遮掩效应。本地传统媒体对制度化政治参与发生负向的影响。这一结果的出现可以从当前媒体所承载的内容来理解。美国学者帕特南(2011: 322)在分析90年代美国社会人们公共参与的下降的原因时,就认为电视因为占据了人们大量的闲暇时间,对美国社会公共参与的下降粗略估计应负25%的责任。本研究虽然集中关注人们如何通过传统媒体获取公共信息,但现实情况是目前地方性的传统媒体中,拥有较高市场占有率的媒体作为公共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都同时大量地关注都市新闻。内容以当地社会生活、意外事故、情感纠纷、揭丑报道等为主,而本地政府信息仍然以会议、政策介绍的宣传形式出现;这些栏目甚少对公共事务、政策问题进行动员和探讨,更多的时间被“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所充斥,不难想象,对家长里短、街头新闻、情感纠纷的关注并不能推动人们对本地政治事务的思考。而政府新闻、领导讲话等形式的新闻能吸引的观众注意力有限。传统媒体并不能激发人们通过制度方式参与政治过程的意愿。但人际政治讨论进入到这个过程之后,状况发生改变,人际讨论在论坛网站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也发挥类似作用。

第二、人际讨论在论坛网站的公共接触和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部分中介效应。人际政治讨论有助于理性政治参与的产生,它改变或放大了公共信息接触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影响,这与国外学者的发现基本一致。政治讨论可以加强媒介使用对政治参与的效果(Scheufele, 2002),讨论促使人们审视媒介内容,理解其中的一些不甚清晰的观点,促进了观点的成熟和论争的质量(Kim et al., 1999),从而

推动理性的政治参与的发生。此外,模型1中互联网政治讨论虽然也被公共信息接触所推动,但却对制度化政治参与的发生并无帮助。这与当前我国网络政治讨论的现状不无关联。网友通过论坛、微博或社交媒体互动,形成虚拟的动员结构(陈先红,张凌,2015),部分讨论常常包含非理性因素,甚至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二) 互联网政治讨论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中介作用

在模型2中,互联网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了中介作用,而人际政治讨论则并未发生影响。公共信息接触的三个概念维度中,互联网政治讨论在本地传统媒体和论坛网站的公共信息接触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发挥了完全的中介效应。

第一、互联网政治讨论在本地传统媒体的公共信息接触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首先要注意的是在未加入互联网政治讨论前,传统媒体的公共信息接触对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产生负向影响,加入互联网政治讨论之后,状况发生变化。换句话说,通过传统媒体获取公共信息的人可能本来并无意愿参与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但如果这部分公众加入到互联网政治讨论之中,则很有可能产生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这或许因为情绪化表达是当前我国网民参与政治表达的主要方式(张明新,2015:104),公众在互联网政治讨论过程中,相互之间容易产生情绪感染,推动非制度化参与的发生。

第二、互联网政治讨论在论坛网站的公共信息接触和非制度化政治参与之间的完全中介效应。论坛网站的公共信息接触推动了公众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行为,互联网政治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一般来说,报道本地事务的新闻网站常常由当地新闻部门主管,是地方公众讨论本地政府行为、公共政策以及网络问政,反腐的主要空间,政府相关人员也会对其中的观点和意见予以关注。人们在这些网站论坛上的讨论或诉求常常因为本地公众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关注而得到回应或解决,参与讨论的公众经历或目睹了这一过程,这推动了人们对本地政治信息的兴趣,培养了类似的行为。

第三、政府自媒体的公共信息接触虽然能够推动互联网政治讨论,但并未促使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产生。从当前政府自媒体的现状来看,一方面其承担了一定的宣传任务,通过自媒体发布的信息大多延续了传统的宣传思维。由于没有专门的新闻从业者的参与,信息的可读性不强。另一方面政府自媒体还处理部分网上政务,方便公众办事。政府自媒体是作为制度化的信息传播渠道而存在的,通过政府自媒体,公众并不能实现与政府或他人的实时讨论,因而也不难理解使用政府自媒体的

人群并不倾向于进行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但由于传播行为本身的关联性，这部分人群更多地使用互联网，对政治也可能持有更高的兴趣，因而倾向于进行互联网政治讨论。

（三）结论

政治参与是一个与民主社会相联系的概念，但这并不意味着非民主政体中不存在参与行为。生活于威权社会或转型社会的公民也会谈论政治，虽然与民主社会中的频率和公开性不同（Lee，2012）。在我国，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推广，社会的发展以及政府对有序政治参与的提倡，公众的政治参与行为越来越活跃，其中既包括制度化的有序参与，也包括非制度化的参与。有序政治参与对政治稳定、社会资本提升毫无疑问有着正面作用。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在我国有着较强的“现实主义”趋向，它是功利的，不采取全面的、激烈的与政府对立的态度，往往会采用争取上级政府支持的策略（张明澍，2013：97）。特定的情境下虽然可能转化为突发的群体性事件，但在国家制度的供给与公民快速增长的参与需求之间的差距增大，制度资源短缺、制度供给不足背景下，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将不可避免地长期存在。

在此背景下，政府的制度建设需要及时跟进，回应社会需求。在制度构建上超越参与需求的增长，充分吸纳和满足各个社会群体的参与愿望和动机，才能保持良好的政治秩序（亨廷顿，2008）。从本文的研究结果来看，考虑到政治讨论在公共信息接触和两类政治参与的发生过程中发挥着中介作用，在制度设计上，可以从促进人际政治讨论和理性的互联网政治讨论的发生着手。此外，当前传统媒体的公共信息传播方式并未引发对社会问题、公共事务的关注和理性探讨，传统媒体没有对政治参与产生有效作用，与之相对地，论坛网站在公共信息传播和政治参与推进方面发挥更显著的作用，相对于传统媒体，论坛网站的大量信息来自于用户，管理和引导的难度更大。从本文的研究发现来看，推动理性政治参与的发生，政府可控的主要在于公共信息接触和互联网政治讨论两个环节。传统媒体应提供更多促进公众对公共事务思考和讨论的内容，改变传统的宣传的话语方式，从而提升人们的政治兴趣。政府需要把互联网公民参与纳入到合理的渠道，以制度化的方式规范网民的社会政治参与，激活参与活力，倡导协商民主（胡正荣，2012），加强对互联网政治讨论的观察和回应是需重点解决的问题。

本研究结论来自一个城市的在地经验。为了考量地方层面的公共信息接触和本地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本文仅关注了地方公共信息传播的主要渠道，而舍弃了其它可能的信息传播渠道。条件所限，调查采用的抽样方法也不够规范，但本文的结

论仍然大部分吻合了既有研究的发现。后续可以在更广区域,进行抽样调查,对模型进行验证和补充。此外,信息接触、政治讨论和政治参与的过程中还有更多可以被考虑进来的变量,后续也可以对这一过程的机制进行更全面的探讨。

(责任编辑:束开荣)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 罗伯特·帕特南(2011)。《独自打保龄球》(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0)。
- 陈先红,张凌(2015)。草根组织的虚拟动员结构:“中国艾滋病病毒携带者联盟”新浪微博个案研究。国际新闻界,(4),142-156。
- 陈云松(2013)。互联网使用是否扩大非制度化政治参与——基于CGSS2007的工具变量分析。社会,33(5),118-143。
- 长沙市统计局(2014)。《2014长沙统计年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方杰,张敏强,邱皓政(2012)。中介效应的检验方法和效果量测量:回顾与展望。心理发展与教育,(1),105-111。
- 胡荣(2006)。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影响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因素分析。社会学研究,(2),1-14。
- 胡荣(2008)。社会资本与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社会学研究,(5),142-159。
- 胡正荣(2012)。权利表达与协商民主:辨析新媒体时代的公民网络社会参与。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6),5-7。
- 塞缪尔·亨廷顿(2008)。《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原著出版于2006)。
- 唐文方(2008)。《中国民意与公民社会》(胡赣栋,张东锋译)。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5)。
- 温忠麟,张雷,侯杰泰,刘红云(2004)。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心理学报,36(5),614-620。
- 杨国斌(2013)。《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邓燕华译)。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原著出版于2009)。
- 燕继荣(2004)。《政治学十五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 张明新(2015)。《参与型政治的崛起——中国网民政治心理和行为的实证考察》。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张明新(2011)。互联网时代中国公众的政治参与:检验政治知识的影响。中国地质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1(6),49-58。
- 周葆华(2011)。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媒体接触——公众参与与政治效能。开放时代(5),123—

140。

周葆华, 陆晔 (2008)。从媒介使用到媒介参与: 中国公众媒介素养的基本现状, 新闻大学, 98 (4), 58-67。

张明澍(1994)。《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Barry, T. E. (2002). In defense of the hierarchy of effects: A rejoinder to Weilbacher. *Journal of Advertising Research*, 42, 44–47. Retrieved from <http://dialnet.unirioja.es/servlet/ejemplar?>

Becker, L. & Whitney, D. (1980). Effects of Media Dependencies: Audience Assessment of Government, *Communication Research*, (7), 95.

Benhabib, S. (1996). Toward a deliberative model of democratic legitimacy. In S. Benhabib (Ed.), *Democracy and difference* (pp. 67–94).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Cho, J., Shah, D., McLeod, J. M., McLeod, D. M., Scholl, R. M., & Gotlieb, M. R. (2009). Campaigns, reflection, and deliberation: Advancing an O-S-R-O-R model of communication effects. *Communication Theory*, 19, 66–88.

Dalh, R. (1971). *Polyarchy*.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David, C., Cappella, J. N., & Fishbein, M. (2006). The social diffusion of influence among adolescents: Group interaction in a chat room environment about antidrug advertisements. *Communication Theory*, 16(1), 118-140.

Eveland W P, Marton K, Seo M, et al. (2004). Moving beyond “Just the Facts” The Influence of Online News on the Content and Structure of Public Affairs Knowledge.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1(1), 82-108.

Graber, D. A. (1988). *Processing the news: How people tame the information tide*. New York: Longman.

Hardy B W, Scheufele .(2005). D A. Examining Differential Gains From Internet Use: Compar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alk and Online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5(1), 71-84.

Huntington, S. P. & Nelson, J. M. (1976). *No Easy Choic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3.

Inglehart, R. (1997). *Modernization and post-modernization: Cultural, economic,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43 Societ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Inglehart, R., & Catterberg, G. (2002). Trends in political action: The developmental trend and the post-honeymoon declin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43, 300–316.

Kelliher, Daniel. (1997). The Chinese Debate over Village Self-government. *The China Journal*, 37.

Kim, J., Wyatt, R. O., & Katz, E. (1999). News, talk, opinion, participation: The part played by conversation in deliberative democracy.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 361-385.

Lee, F. L. F. (2009). The impact of political discussion in a democratizing society: The moderating role

- of disagreement and support for democracy.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6,379-399.
- Lee, F. L. F. (2012). Does discussion with disagreement discourage all types of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Survey evidence from HongKong.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9,543-562.
- Mansbridge J.(1999). Should Blacks Represent Blacks and Women Represent Women? A Contingent "Ye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61(3),628-657.
- McGuire, W. J. (1986). The myth of massive media impact: Savagings and salvagings. In G. Comstock (Ed.), *Public communication and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173-357.
- McLeod, J., & McDonald, D. (1985). Beyond simple exposure: Media orientations and their impact on political process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12, 3-33.
- McLeod, J. M., Daily, K., Guo, Z., Eveland, W. P., Bayer, J., Yang, S. & Wang, H. (1996). Community integration, local media use, and democratic processe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3(2), 179-209.
- McLeod, J., Scheuffele, D & Moy, P. (1999). Community, Communication, and Participation: The role of mass media and interpersonal discussion in local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6(3), 315-336.
- Moy, P., McCluskey, M. R., McCoy, K., & Spratt, M. A. (2004). Political correlates of local news media u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4(3), 532-546.
- Moy, P., Torres, M., Tanaka, K., & McCluskey, M. R. (2005). Knowledge or trust? Investigating linkages between media reliance and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59-86.
- Nir Lilach. (2012). Cross-National differences in political discussion: Can political systems narrow deliberation Gaps?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2, 553-570.
- Rojas, H.; Puig-i-Abril. (2009). Mobilizers mobilized: Information, expression,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4, 902-927.
- Sanders, A. B. (2007). *Losing Control: Presidential Elections and the Decline of Democracy*.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Scheufele, D. (2002). Examining differential gains from mass media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participatory behavior.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9, 46-65.
- Shah, D., Cho, J., Eveland, W. P. Jr., & Kwak, N. (2005). Information and expression in a digital age: Modeling Internet effects on civic participation. *Communication Research*, 32, 531-565.
- Shah, D., Cho, J., Nah, S., Gotlieb, M. R., Hwang, H., Lee, N.-J., et al. (2007). Campaign ads, online messaging, and participation: Extending the communication mediation mode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57, 676-703.
- Shah, D. V., Rojas, H., & Cho, J. (2009). Media and civic participation: On understanding and misunderstanding communication effects. In J. Bryant and M. B. Oliver (Eds.), *Media effects: Advances in theory and research (3rd ed.)* (pp. 207-227). New York, NY: Routledge.